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商人与中国 近世社会



唐力行 著



917-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唐力行著.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ISBN 978-7-100-12971-8

I. ①商… II. ①唐… III. ①商人—研究—中国—
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770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修订本)

唐力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971-8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¼

定价:59.00 元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出版说明

学术升降,代有沉浮。中华学术,继近现代大量吸纳西学、涤荡本土体系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因重开国门,迎来了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迸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产生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出自新一代学人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当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也成为激荡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

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我馆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系统整理当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与突破,更立足于向世界展示中华学人立足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慧,使其不仅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成为滋养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众多学科。丛书选目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所收须为立意高远、见解独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或论文集;须经历时间的积淀,具有定评,且侧重于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

自 1897 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近年又确立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出版宗旨,继上

2 出版说明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系统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近期又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学术经典丛书陆续推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为又一重要接续,冀彼此间相互辉映,促成域外经典、中华现代与当代经典的聚首,全景式展示世界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尤其寄望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6年1月

自序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徽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到90年代初本书的完成,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选择这一课题,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主角的商人应该怎样定位?怎样才能让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摆脱传统时代的窘迫境地?商人怎样才能市场经济中不必依附官府或是官商结合而保持独立的主体地位?探索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互动关系,正是应了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撰写《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也与我当时的思想、兴趣、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80年代,走出“文革”的阴影,砸碎思想的枷锁,进入了一个新启蒙的时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历史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基本线索的讨论等,其热烈、深刻是1949年以来所仅见的,史学界集体思考当代中国发生“文革”这样数千年未有之大浩劫,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有其结构上的必然性?阶级斗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近代社会发展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所能涵盖?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启蒙意义,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先后撰写了“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论文,阐述了我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思考。至今难忘 1986 年参加以史学方法论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会上大多数代表对历史学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得了共识: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科当然也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代替历史学的专有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专有理论和方法论。此论拨开迷雾,开辟了延续至今三十年的历史学科发展新路,从此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大规模地被引进,极大地推动着我国史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会议总结时指出:这次会议并不在于大家讨论了多少新的方法论,而在于肯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应该从一元走向多元,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本次会议的意义。会上,我作了“从系统论的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的发言,较为系统地谈了我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见解。此文被收入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也是国内第一本《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从 1988 年起,我开始参加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年会上集中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内涵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学者达成了共识: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思想学术的超前性与引导性,这一特征又决定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因而知识分子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痛苦纠缠中前行。此后我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再难见到这样的学术气氛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会史丛书”主编蔡少卿教授邀请我承担中国历史上商人阶层的撰写任务。80 年代是我学术起步的十年,在商人研究的同时,参加这些史学理论的研讨,大大加强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自觉性、前瞻性。史学理论、方法论,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帮助我构筑起大历史的研究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从事微观、中观的历史耕耘,形成了我个人

研究的特色,以及我的思想、兴趣和经验,而这一切无疑又在我的这本处女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穷尽的对话。商人阶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商人的故事在不断演绎,折射着文明的尺度和时代的风云。多年来我依然在本书所开辟的研究领域,与商人阶层进行着对话,这些对话载入了《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苏州与徽州:16至20世纪两地互动与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论著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三农问题严重。《徽州宗族社会》关注商人与乡村自治问题。徽州乡村社会素有“此间仿佛武陵溪”之说,拥有深厚的徽文化底蕴、强大的徽州商帮、绵延千年的宗族组织,在这三大要素构成的特定区域社会生活体系中,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徽商源源不断输回的财富、士绅的文化权力,保障了徽州乡村宗族社会的自治、稳定和兴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苏州与徽州》就地处沿海平原的苏州与地处内地山区的徽州两地在16—20世纪发展的互补与差异作了研究。苏州是江南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经济的中心;财力雄厚的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得大宗商业利润。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而他们的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的旧秩序。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的,它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认知,这

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使这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形态。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日益严重,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衰败几乎成正相关。《延续与断裂》揭示徽州经济、文化、社会三要素的良性循环,除了有本土的内循环外,还有着超越地域疆界的外循环。徽商遍天下,尤其在长江三角洲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内外循环相互依托。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内循环断裂,抗战时期徽州外循环断裂,但是战乱一旦结束,依托于另一循环的支持,断裂的循环迅速恢复,乡村再现稳定与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在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徽州乡村自治难以为继,但是在城市自治组织——徽州各县旅沪同乡会全方位支持下,乡村自治仍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从资料可知,胜利后的徽州乡村仍存在着一个乡绅的文化权力网络。传统的城乡自治在20世纪50年代初终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书初版至今二十余年来,社会变迁跌宕起伏,商人的两难境地依然如故。笔者与商人阶层的对话还将进行下去。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此言得之。

唐力行

2016年9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社会中的商人	1
第一节 商人与社会结构	1
一、商人的黄金时代	1
二、商人的两难境地	5
第二节 商人的分类与分层	14
一、商人的分类	14
二、商人的分层	18
第二章 近世前期商人的整合与商帮的兴起	32
第一节 商人的初步整合	32
一、商人的认同标准由血缘扩及地缘	32
二、商人价值观的整合	37
第二节 十大商帮	41
一、商帮的兴起	42
二、商帮活动的区域及商业网络	48
三、商帮经营活动的特征	51
第三章 商人的组织	67
第一节 商人的亲缘组织——宗族	67
一、宗族势力在商业经营中的功能	68

8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二、商人与宗族势力的普遍结合	82
第二节 商人的地缘组织——会馆	84
一、会馆的类型	84
二、会馆的功能	86
第三节 商人的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	90
一、商人业缘组织的兴起及其特征	90
二、商人业缘组织的功能	93
第四章 商人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100
第一节 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	100
一、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与世界市场	100
二、海商的走私活动与世界市场	104
第二节 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117
一、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117
二、“萌芽”的脆弱性与商人的软弱性	126
第五章 商人与社区生活	129
第一节 商人与妇女	130
一、商人妇的社会功能	130
二、商人妇的命运	139
第二节 商人与家庭、宗族结构	148
一、近世社区的家庭与宗族结构	148
二、商人对近世社区结构形成所起的作用	154
三、社区结构的反作用	163
第三节 商人与社区生存空间的开拓	165
一、商人与社区村庄的演变	166

二、商人与人口的地理密度	171
第四节 商人与社区的相互作用	178
第六章 商人文化	183
第一节 商人文化的形成	186
一、理学的分流	186
二、商人文化的整合	189
第二节 商人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201
一、商人文化的特征	201
二、商人文化的历史地位	216
第七章 近世后期商人的整合与资产阶级的兴起	220
第一节 商人的再度整合	220
一、错过的时机	220
二、商为“四民之纲”的价值观	226
第二节 商人阶层的分化与重新组合	242
一、商人第一层次的分化	243
二、商人第二层次的分化	246
三、商人第三层次的分化	248
四、商人第四层次的分化	250
五、商人第五层次的分化	253
第三节 商会——资产阶级的结集场所	258
一、从行会到商会	258
二、商会的功能	264

第八章 商人在近世社会演进中的角色·····	272
第一节 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	272
一、社会经济进步的累积·····	274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275
三、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277
第二节 近世商人的两难境地·····	284
一、两难的选择·····	284
二、挣不脱的怪圈·····	288
第九章 难以走出的近世社会·····	301
第一节 抗战前夕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301
一、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302
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306
三、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	313
第二节 难以走出的近世社会·····	329
新版后记·····	345
再版又记·····	347
唐力行著述编年·····	349

第一章 传统社会中的商人

第一节 商人与社会结构

一、商人的黄金时代

我国的商业活动起源甚早。《易经·系辞》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关于我国商业活动的最早一则传说。《尚书·大传》说，舜在受尧禅让之前，曾经“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舜是传说中最有名的商人。这些传说或许尚失之邈远难征，然而商代大量的出土文物和甲骨文则已使“殷人重贾”的情态宛然可考了。我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时间上仅稍后于古代埃及。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便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酷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为这一时代的来临，预备了条件。西周的分封制为春秋战国的多元政治埋下了伏笔；西周的土田国有制，使统治者不必提出抑商、轻商的问题，因为既然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也就不存在商人兼并土地和农民“弃农经商”的问题。从《周礼》所反映的社会分层来看，商贾的地位居于农夫之上。《周礼》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而执，以饰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饰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

之,谓妇功。”但是,井田制的自给自足,使社会对商品的需求量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与分封制相应的官商制度,对于自由商人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当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室衰微时,“工商食官”的制度也随之没落。多元政治的格局迫使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把国力强盛与商业联系到一起,他们认识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商不出则三宝绝”^①。因此,纷纷实行惠商政策,争相招揽商贾。春秋首霸齐桓公,便是靠商业富国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桓公起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管仲在辅政的四十年间,积极发展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他曾颁令“使关市讥而不征”,采用免税的方法,鼓励外来商人把齐国所需的兽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皮革等军需用品和奇珍异物输入齐国,并把齐国盛产的鱼、盐和手工业品输往别国。管仲还给予外来商人以优惠待遇。不但三十里置一驿站,积储食物以供客商,而且齐国的都城临淄还“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供给饮食,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②。齐桓公会盟诸侯时,也不忘做出亲善商贾的姿态,要求各诸侯国“毋忘宾旅”,降低关税^③。这自然是为了齐国的商业利益。春秋时郑国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商业。郑国是个小国,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介于各大诸侯国之间,西边是秦国,东边是齐国,乃晋、楚、齐、秦等大国进入中原的必争之地;也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途。郑国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各诸侯国之间周旋,以扩展同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流来保存自己,使周边各国维持一种均衡,造成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管子·轻重乙》。

③ 《管子·幼官》。

谁也不能独占郑国的局面。从“弦高犒师”的故事,便可知郑国商人在当时诸国之间活跃的程度了。各国的商品都经过郑国中转集散,一方面巩固了郑国在夹缝中求发展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商品过境、交易的税收也增加了郑国的实力。正因为商业与国家的存亡休戚相关,郑国十分重视对商人权益的保护。公元前522年,晋国使者韩起谒求郑国国君为其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只玉环以拼成一对。郑国执政子产对韩起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勾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①子产强调了郑国二百年前与商人订立的盟约:只要商人不叛国,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活动。表示不能违背盟约向商人索取玉环。这件事虽小,但足以说明郑国对保护商人利益的重视。

到春秋末和战国时期,铁器被广泛地使用于农业生产,井田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新兴的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渐取代了奴隶制经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地主制经济下,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小农户。这种五口之家式的小农户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必须仰赖商品的交换以换得某些不能自己生产的物品,例如盐、铁、酒、铜等。农民为了交换自己需要的商品,必须出卖一部分自己的产品,不仅出卖剩余产品,有时还要出卖一部分必要产品。农民所生产的用于交换的产品,就一家一户而言,数量是极其微小的;但从整体上看,其数量就相当可观了。这就为一批“多钱善贾,长袖善舞”的名商大贾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春秋战国时代最为有名的大商人是范

^① 《左传·昭公十六年》。

蠡、子贡、猗顿、郭纵和白圭。范蠡，春秋后期楚国人。他在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即弃官经商，定居于当时交通中心陶邑（今山东定陶），自称“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中三致千金”^①。后来，“陶朱公”就成为富商的别称。子贡，复姓端木，名赐，春秋后期卫国人，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学后，不愿意做官而去经商，这一选择得到了孔子的赞同：“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②孔子周游列国，子贡在财力上给予全力支持，正如司马迁所言：“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③。猗顿，战国时“鲁之穷士”。他先是“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④。后来又从事河东池盐的产销，成为巨富。郭纵，战国时赵国邯郸的大冶铁主，“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⑤。白圭，周人，曾为魏相，后又仕于秦国，其间曾从事农副产品的贸易，是一个擅长商业经营之术的大商人。

这些富商巨贾皆精于预测物价行情的波动，利用货物供需之间的价差获取利润。到战国时代金属货币普遍流通之后，商人对物价的操纵，就更加灵活便利。商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治生之学”。范蠡、计然提出了“时用则知物，知斗则修备”的积蓄待乏的经营战略；以及“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⑥的经营谋略。白圭重视市场行情的预测，强调要“乐观时变”，“敏于趋时”，掌握商品经营的主动权；他讲究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论语·先进篇》。

③ 《史记·货殖列传》。

④ 同上书。

⑤ 同上书。

⑥ 同上书。